

因此，无论在克服错误性方面，还是加强共同性研究方面，加加美教授的论文，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召开的多次研讨会，都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后，我想谈一点稿子里没有写的内容，也就是说对加加美教授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概念进行一些探讨。首先，现代中国学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定位，它和几十年前的现代中国学概念是否还是一样的？现代中国学有没有主体意识？从我们现在参加大会的发言来看，大家提到的现代中国学，都是从客体，也就是从中国以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那么中国本身能不能称作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和中国的当代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各种学科的总和？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关于新范式，很多学者已经进行论证了，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最后，我再讲一下关于国策研究的几句话。完全定位于国策研究的、为国策服务的研究是应该避免的，我认为在中国当前已经出现了那种开始社会化国策研究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为国策服务的研究。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国内学者都知道的一种“沈志华现象”，沈志华先生是国内一个民间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现在在中国被视为是一流的学者，在座的比如金观涛先生跟他很熟悉，加加美先生也应该了解，因为他的夫人李丹慧女士曾经和你一起工作过。那么，作为沈志华、李丹慧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在国内值得评价的就是说，无论从官方角度，从民间角度，从中国改革的激进派还是稳健派来说，还有从美国方面，从日本方面，甚至台湾方面，这些学者都对他们的成果予以认可。所以我觉得加加美先生提出的共同认识论，如果我们找准了这个前提的话，是可以实现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听了前面的发言，或者在会议讨论中间，大家对这种共同认识论能不能实现有所怀疑，

所以我想我个人的理解，加加美教授提出的共同认识论不是要所有的研究都得出共同的结论，而是要通过共同的研究探讨来共同接近真相。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司会 引き続きまして、南京大学の周晓虹先生にお願いします。

●—周晓虹 大家好！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做关于加加美先生所提出的建立一种新的中国研究范式的讨论。我给会议提供的一篇文章比较长，所以我只能简单地来谈一下我的基本看法。在中国研究的过程中，刚才很多的学者，包括上午加加美先生都提到，它最先是有一种从一种国别研究发展而来的，那么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决定了它最初是冷战的一个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产物。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提到，刚才 Madsen 教授的讲演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师 John King Fairbank，也就是费正清，实际上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将一种原先有关中国文化典籍历史的汉学研究，转型为一门包括各种社会科学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研究，我认为这是他做得最为成功的一点。但是刚才讲到，关于这种冷战状态下的国别研究，那么我在想，是不是国别研究就一定会导致东方主义这样一种论断，或者说它是否一定就不能够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或者我们叫它价值无涉，就是 Value-free 的这样一种立场，我认为并不尽然，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最早在他的方法论的著作中讨论价值中立的时候，实际上价值中立是有一个限度的，那么这个限度就在于价值在研究者重试你的研究，进行问题的选择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并不反对或者不否认研究者存在着价值的涉入这样一种现象，但是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是在你搜集到资料并且对资料进行解读的时候，你这时应该保持客观的立

场，不能为你主观的价值所左右。我刚才听到冯昭奎先生的发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刚才提到的关于食品事件，我觉得在关于食品事件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拿这个来举例子，那么也就是说，在你研究中国的食品事件的时候，这个本事你可以受到你的价值观的左右，因为你现在比如讲报纸上或者其他方面也都经常看到报道，中国社会在高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出现了环境污染，包括食品工业的问题，那么你出于这样一个动机，可以去做关于食品的研究，但是当你的研究的成果和其他的数据，就像刚才他给我们摆出来的这些数据出来的时候，在对这些数据进行解释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从你的、刚才讲的受到你的价值的出发点去出发，就是忽视比如美国和加拿大的食品的问题，而只强调中国进口日本的食品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应该说你就没有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

我在文章中间用了相当的篇幅去谈论中国研究的动力从何而来，第一个动力实际就是上午加加美老师讲到，然后我们大家都经常提到的，实际上就是冷战的动力。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冷战之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研究的动力它又来自什么地方？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可能关于1978年以后中国研究的动力不但来源于西方世界，也来源于中国本土，包括中国知识界，因为其中一个共同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这引起了世界的学术界和中国知识界的共同关注。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的研究界有可能超越传统状态下狭隘的领域，进入包括欧美在内的主流的学术圈。因为早先我们大家知道，国别研究或者说地域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秉承东方主义的这种观点，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边缘化的，这一点在傅高义教授的有关论文中提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像裴宜理就谈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才有可能从原先

的一个“消费领域”，就是说它仅仅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而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它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我想把这个观点作为加加美老师观点的一个补充，我觉得只有主观共同性和刚才我讲的研究本身能够产生一种原创性的分析价值，这两个条件都存在的情况下，地域研究才能向一种独立的国别研究发展。

第二，关于加加美老师所说的中国研究向国别学转变的一个条件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主观共同性，他翻译成共同态度性，我个人是根据英文 co-behaviorism 把它翻译成“共意行为主义”，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另外，包括 inter-subjectivity 的译法，按照中国通常的译法是把它译成主观间性，它来源于胡塞尔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主观间性本身的产生也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国外的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学者对东方主义的警觉与放弃；第二个可能还有重要的，就是中国自己的学者对本国进行主观反思，就是 reflective 这种意识的一种萌生，并且这两者之间进行互动，那么才有可能产生加加美老师所说的在中国研究中间主观间性的产生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我认为作为一种国别学的中国研究，它的产生才有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刚才已经给我出示了一个，还剩一分钟了，所以我就不能再去讲它。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讲一句话，就是加加美老师这篇文章我相对来说读得比较早。今年5月在南京大学我们举办了“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是我们和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一起举办的，他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紧接着他的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是我们系的张玉林教授翻译的，我现在已经把它编出来了，很快将发表在我们的《中国研究》杂志上，所以刚才周长城教授开始也说了，我们对加加美老师四十年始终如一地对中国研究的热

情表示钦佩，谢谢！

●—司会 次は、ハワイ大学のエリック・ハーウィット先生ですが、先生は現在、本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の訪問教授も兼任されております。それでは、お願いします。

●—エリック・ハーウィット Thank you Professor Yamamoto. I found Professor Kagami's paper to be an excellent and thorough review of the course of research on Asia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Japan during the wartime and postwar period. Professor Kagami takes on an ambitious task to propose a new paradigm for researching Asia and for looking in particular at China. Overall I found the most fascinating parts of the paper to be the historical discussions of the two nation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sia. Professor Kagami puts this in the context of research streams that are either sponsored and essentially directed by the state, or those that avoid state sponsorship and therefore give the researcher more freedom of analysis. My only thought here is that Professor Kagami could make this connection somewhat more explicit, and extend the argument to consider that those researchers ei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Japan who do not receive government funding, may at

least in theory, have more ability to conduct work that is independent of their nation's policy interests.

I agree with Professor Kagami's larger argument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ategoriz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of the postwar era as state policy-driven in nature. I understand this is part of the basis for his advocat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sia and China. His paper also makes a striking point that, somewhat ironically, a form of Orientalism can be found in Japanese area studies of the Asian region of China. I am less familiar with the Japanese case, but I find his analysis compelling. Usually many Americans think of Orientalism as mainly western approaches to foreign studies, but Japanese also share an Asian heritage, so it seems at least to me that there should be less Orientalism here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Europe.

To me, it also seems there has also been a recent trend in American academia to move away from the policy oriented approaches that Professor Kagami indicates prevailed in the postwar deca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find this to be the case in at least some parts of my own

